

穿警服抖威风抖的是“权力快感”

他们为什么要穿得像警察? 现代快报 12月12日 作者 刘洪波

【快报一评】

近来,穿着仿警察制服(以下称仿真警服)现象普遍,为此,即日起至明年1月5日,全省将开展集中清理整顿违规穿着仿真警服问题专项行动。再穿仿真警服,当心罚款1000元。(武汉晨报12月3日)

【成都商报一评】

前几天读到新闻,湖北省整顿滥穿仿真警服行为,违者可处罚1000元。湖北的整顿进展还没有看到,却读到了来自陕西蒲城的消息,一名姓成的男子因穿着和警服相像的防寒服,被蒲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拿下,处以罚款1000元。湖北整顿仿真警服,重点在保安、内保人员。陕西蒲城的事情,是集中整顿中的个例,还是国保人员的灵机一动呢?不知道。蒲城警察将人拿下后,前一天说假冒警察,后一天说嫖娼,1000元钱一时说是罚款,一时说是暂扣,前言不搭后语,显属处置无据,乱找由头。我想,成先生被捉这件事,本身就可以说明样式、颜色与警服相仿的衣服为什么会流行起来。国保人员是做什么的,管治安的吗?管理警察风纪的吗?怎么在大街上管起衣着来了呢?成先生穿着与警服相像

的衣服,应属穿着自由,他没有佩戴警用或仿警用的任何标志,不应受任何干涉。穿警服的人,随便就可以将一个穿着并不违禁的人拿下罚款,仿真警服的现象难道不该流行起来吗?

今日中国,衣装的丰富已非三十年前可比,但仿冒警服的衣服仍然不少,这是值得玩味的。

一些社会单位的保安、内保、协警穿着高度仿真的警服,明显显示出让人误认为是警察的意图。前几天媒体上揭露一个叫做“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的机构做局骗人,这个局对公共权力机构进行了全面复制,内部有党团组织办公室,职位称呼为局长、副局长等,服装、车辆等等都与警用正装酷似。这些成体系的欺蒙行为,与一般人穿着仿真的警服是有区别的,至少从目的上说,一般人的穿着在于娱己,而这些成体系的乱真意在误人。

对一般人来说,穿用仿制的警服,是一种特殊的美学趣味

或心理偏好。不过这种美学趣味或心理偏好发生的频度过高,就是一种社会性的美学趣味和心理偏好了,它是有社会含义的。仿制的警服作为一种符号,使相当多的人获得了心理满足,这是由角色装扮实现的。这种角色扮演不是要让别人相信他的警察身份,而是在心理上对自己进行那一符号的赋值,它代表着一种对权力的向往。

在一个社会中,警察成为拟制的对象,以及他投射为一种社会性的美学趣味和心理偏向,不能说是正常。在一些国家也曾出现类似的现象,无不伴随着社会和群众心理的混乱,集体性的拟制代表着人们对一致性、力量感的崇拜,而个人性的模仿代表着对警察的欣赏或羡慕。

毫无疑问,警服是日常生活中能够在身体上体现的最常见的权力标识。今天,这种标识被拟制,这种符号被应用,显示了权力的行为状态,也隐喻着权力能够发挥的作用。

【快报再评】

我不知道,普通人光天化日下穿仿警服,与女港星们在密室里穿制服找乐是不是一样,能否找到有点变态的快感,但我敢肯定,他们如此着装,不是出于对警察的敬,就是出于畏。文革初流行绿军装,因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人地位高受尊敬,不惜趁人家“蹲坑”时抢人家的“军帽”,那是为了过把瘾。现在穿仿警服的人,有这种敬警之心吗?恐怕不多,小孩子只怕也是觉得扮警察威风。为什么要严惩穿仿警服的人,不就是担心有人狐假虎威,败坏警察名声吗?

其实,穿仿警服,没有大盖帽和相应的警具,现在很难鱼目混珠,也就能冒充个保安、联防队员或辅警。这些“类警察”社会地位虽不高,但确实有一定的管人的权。就这么一点权,就让一些人花了眼,要借它来抖一抖,可见我们的社会对公权的规范和驯服还任重道远。

公务员不愿为人民服务只因人民没权?

公务员究竟该为谁服务 成都商报 12月12日 作者:志灵

【成都商报一评】

虽然有人怀疑发帖者的真实身份,但谁都相信帖子的内容是真实情况的客观反映。不过,相信更令公众愤怒的是专家对“对上负责”的辩解: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白智立看来,“官员就是对上负责的,这没有什么不妥”“行政体制就是要对上负责,否则难以保证政令通畅和行政效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此语一出,公众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不过,理性地看,白教授的说法并没有错,因为即便在民主政治完善的地方,对选民负责的也只是行政首长,其他的副职以及绝大多数公职人员,都是按照行政首长的意图来设置,自然要对上负责。这就叫行政首长拥有组阁权,它不仅是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也为我国法律所明确规

定,只不过我们没用这个说法而已。我们的宪法、全国以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有相应规定。行政体系之所以有如此架构,本身并没有问题,因为行政管理要实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以及行政效率,必须要有一套严格的对上负责制度。

真正可怕的是行政首长也难以受到有效的制约。在行政体系内需要对上负责的同时,以行政首长为代表的行政系统却要同级人大负责,受其监督和问责。在巨大的问责压力下,需要对公众负责的行政首长,自然会按照公众对自己的要求来“组阁”,来要求下属以此为标准“对上负责”。

这样的“对上负责”,实际上是“曲线救国”,间接地对公众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上负责本没错,问题是负责什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对上负责”之所以演变成完全、彻

底和直接的“为领导服务”,恰恰是因为行政首长的不可被问责性。虽然自非典以来,已有不少高官被问责,但大多还是来自更高层次的直接助推,而非民主程序的完善。

一个可以被民意充分有效问责的行政首长,必定是一个在民意面前谦恭有加的官员,而由其组建的行政系统,对民众负责是一个首要的原则,因为这是其存在的前提。甚至可以说,一个激起民愤的公务员,无论其职位高低,等不到民意对行政首长的问责启动时,对民意负责的行政首长以及行政系统早已启动了内部的问责程序。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即便公务员对上负责又何妨?只要他负责的内容没问题即可。

【快报再评】

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早就有了:一,“为人民服务”;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回避下面两个问题,北大也好南大也好,教授也好校长也好,都是不着边际:一是权力来源,行政首长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吗?如果他的权力不是建立在人民广泛同意的基础上,谁来对他问责?二,一个地方的行政首长真的是地方首长吗?谁都知道,党委书记才是地方真正的“一把手”,行政首长即便是党员,也只是地方核心决策机构党委的副书记或地方党委领导下的政府党组书记。这样的制度安排每天都见诸各地报纸,难道是什么不能公开言说的国家机密?地方人大主任一般是地方党委书记兼任(政治局委员所在省市区别外),这也是常见报的。人大问责“行政首长”,能问到真正的决策责任吗?最多也就问到办事不力吧!

教授羡慕处长 因为“越教越瘦”

遏制知识分子的官僚化 北京日报 12月9日 项贤明

【北京日报一评】

学就是学,仕就是仕,一心一意,才能做好各自的事情。一个人要做知识分子,无论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专业知识分子,独立判断的能力和勇气都是必需的,科学真理不会因人的官位而发生改变。做官则不同,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集体,有意见可以保留,但上级的决定还是要执行。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而后“仕”者,在仕途上走的时间长了,渐渐习惯了说话看长官的脸色、听上级的口风,丧失了探求科学真理的思维能力,然而,却仍然占据着学者的头衔,甚至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在说话时也要看有权势者的眼色,判定真假

也要以上级是否喜欢、对自己是否有利为依据,那么,这个国家恐怕是很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

学而优并非就不可以仕,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学是学,仕是仕,学而优者,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可以仕而优,同样,仕而优者,也不一定就可以学而优。管理者需要专业知识,但他们对知识的需求与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探求和验证是两回事儿。可是,我们在社会中看到的现实状况是,若是学而优而未仕,即便你学富五车,也很难赢得应有的学术地位,相反,唯有“仕”了的学者,哪怕学而优,却照样可以担任某某学科带头人、某某学术评审委员。可见,学术的职务总是附属于行政的职务的,行政上不混个一官半职,学术上做得

再好,也得不到社会甚至同行的承认。说到底,“学而优则仕”,还是“仕”高于“学”的官本位思想在作怪。正是在这种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学衔与官衔也已混为一谈。学衔只是对一个人过去学术贡献的确认,它与官衔的级别差异和相应的权力大小有着根本不同。

在官本位思想盛行的风气下,不仅学衔被当成了官衔,学者变成了官僚,就连大学也按照官阶划分等级。当学术界变成了名利场的时候,不仅国家难以走向创新,学者要想作为知识分子来生存也会变得异常艰难。

要遏制知识分子的官僚化,首先须破除官本位的思想,真正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上培育尊重真才

实学而不是尊重“学官”的风气,让一个无官无职的纯粹知识分子也能得到同行的承认,受到社会的尊重。

【快报再评】

道理讲得都对,就是这题目怪怪的:什么叫“知识分子的官僚化”?是指知识分子们满口官话,还是指知识分子们像官僚一样有权有势对工农大众指手画脚?说的不过是“知识分子”想当官,那就该追问他们为何都跳起来想抢乌纱帽?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当官通吃,一个处级官员的地位和好处远远高过一个“越教越瘦”教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利益导向,或者说就是激励机制,出了问题,还总不能改,这才是我们应该深思明辨拿出办法来的。

软实力不是虚玩艺

从中文色情封面看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青年报 12月12日 作者 田德政

在学术界颇负盛名的德国马普研究院,为配合其刊物《马普研究院期刊》的中国专题,把五行看似是诗句的汉字印成封面,想让读者一看便知内里乾坤,但这几行汉字来自色情场所的传单,令中国读者不满。事件曝光后,该期刊的编辑委员会尴尬不已,研究院亦深表遗憾。(中新网12月10日)

【中国青年报一评】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据说全球已经建百余所“孔子学院”,一个非官方的统计显示:世界上把汉语当做外语来学习的人已经超过了1亿。从这一角度讲,可以说用中国文化影响世界的时代已经到来。

我们陶醉在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同时,也不得不尴尬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软实力在世界的影响力,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甚至还可以说,还相当薄弱。如果说德刊这次封面事件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在看谷歌地球的时候,就会发现,谷歌地球对中国地名的标注可谓错误百出,这正说明了人家对我们的陌生。

实现大国崛起的梦想,不仅需要经济增长,更需要软实力的强大。按照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在今天,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让中国文化适应时代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提高中国文化的创造力、凝聚力、亲和力,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当有一天,中国的文化元素俯拾皆是的时候,老外们就不会再出像德国刊物这样的“洋相”了。

【快报再评】

所谓“软实力”是一个既含糊又清晰的概念,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产生而发展的,在古代,实力就是军事力量。到了近代,特别是“二战”以来,仅凭军事力量已不可能征服天下,现代武器本身是科技的产物,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准、人才创新能力的体现,本身就受一定的制度文化的制约。

“软实力”首先与文明水平有关,比如瑞典是一个小国,它设立的诺贝尔奖却有世界影响力,也就是说它的判断力和公信力令全世界大多数人信服。但是,“软实力”(影响力)的大小,与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综合国力)也不是没有关系,它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对世界承担责任的能力,也包括价值取向和道德感召力。实力、软实力,它不是靠玩虚话搞宣传能赢得的,“自我推销”当然重要,但人家不认同也是枉然,所以要虚实并举,唱工做工俱佳。